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格非论

陈斯拉 / 著

作家出版社

谢有顺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陈斯拉 / 著

格非论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非论 / 陈斯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6
(中国当代作家论)

ISBN 978-7-5063-9944-9

I. ①格… II. ①陈… III. ①格非 - 作家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1170 号

格非论

总策划: 吴义勤

主 编: 谢有顺

作 者: 陈斯拉

出版统筹: 李宏伟

责任编辑: 秦悦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2 千

印 张: 19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944-9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陈斯拉 ■ 1980年出生，广东河源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文艺评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三十篇，其中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两次。主持省级课题一项，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参编著作、教材三部。

主编说明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约我写文学史。很多文学教授，都把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当作毕生志业。我至今没有写，以后是否会写，也难说。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学史合同在我案头，我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没有签。曾有写文学史的学者说，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就没办法写。

何以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未必懂得鉴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举大家熟悉的胡适来说，他写了不少权威的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

《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更多是概念上的认识。但我觉得，审美的体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创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说，文学写作“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这种灵魂的赤裸呈现，若没有审美理解，没有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它。

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贾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不久前阿来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

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文论也独树一帜。许多批评家会写诗，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就会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与评论必然相互影响。

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

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重识作家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重新强调作家论的意义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作家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1920—1930年代，作家论就已经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写的作家论，影响广泛。沈从文写的作家论，主要收在《沫沫集》里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以作家论写作闻名。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也是作家论。只是，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

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

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极富价值。

为此，作家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这套规模宏大的作家论丛书。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选取了五十位左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又分别邀约了五十位左右对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评家作为丛书作者，分辑陆续推出。这些作者普遍年轻，锐利，常有新见，他们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以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代文学写史、立传。

我相信，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谢有顺

2018年4月3日，广州

目 录

引言 作为意念核心的“存在”

- 一、理解中国当代文学 / 1
- 二、先锋视野里的格非 / 3
- 三、格非的写作小史 / 6
- 四、写作的内核：对存在的勘探 / 10

第一章 从木匠到作家

- 第一节 生命最初的形状 / 15
- 第二节 十五岁出门远行 / 26
- 第三节 师大读书且论道 / 32
- 第四节 “博尔赫斯的面孔” / 37
- 第五节 对存在的勘探 / 44

第二章 作为先锋的格非

- 第一节 无序的现实与有意味的形式 / 52
- 第二节 记忆与梦幻 / 58
- 第三节 空缺与重复 / 69
- 第四节 圈套与迷宫 / 80

第三章 格非和他所处的时代

- 第一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 / 88
- 第二节 叙事的历险者与存在的勘探者 / 98
- 第三节 影响的焦虑：小说的歧途 / 106

第四章 文化转向与叙事转型

- 第一节 变化的缘起 / 112
- 第二节 格非的变与不变 / 121
- 第三节 乌托邦的诗学 / 134

第五章 欲望与困境：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 第一节 智者的迷惘 / 143
- 第二节 欲望的诗学 / 147
- 第三节 “声色”与“虚无”：时代性的两个面相 / 166

第六章 桃花源：存在的秘境

- 第一节 革命乌托邦 / 171
- 第二节 政治乌托邦 / 178
- 第三节 爱情乌托邦 / 187
- 第四节 诗人之死 / 191
- 第五节 古老的敌意 / 202

第七章 抒情与诗意：格非的中国故事

- 第一节 诗人小说家与中国小说传统 / 214
- 第二节 红楼笔法下的世态人情 / 221
- 第三节 内在超越的精神向度 / 237
- 第四节 中西融合的叙事资源 / 244

第八章 “重返时间的河流”

第一节 故乡的回望 / 253

第二节 精神还乡 / 265

第三节 文学的回声 / 275

结语 深刻的重复 / 279

附录 格非创作年表 / 283

引言 作为意念核心的“存在”

一、理解中国当代文学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文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自然与我们“学而优则仕”的情结有关。回看历史，从先秦儒家的“兴观群怨”说到宋代理学的“文以载道”观，文学不仅承担了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更肩负起了安邦定国之使命。而文学真正成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普遍意义上的精神现象，那则是现代性的产物。当社会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与物质财富创造时，消费文化的盛行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则成了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这些都促使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于是，文学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功用也开始变化，文学开始不再被意识形态填满，不再充当社会的旗帜和意识形态的号角，文学开始退回到生活的边界，退回到人本身，也就是退回到文学本身。

由此，必须提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先锋派的形式主义探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年轻激进的小说家，以强烈的反叛精神与浓郁的现代气息，经由语言和形式的突破口，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叛离。这个勇敢的写作群体，多师法西方现代小说，具有高度的语言自觉和强烈的文体意识，他们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和语言表现力，丰富了小说的艺

术形式，扩展了文学的边界，从而被人称为一场“无边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学革命的先行者，是先锋派，在艺术上代表着一种前卫的姿态。这也意味着对传统写作范式的一种背离，小说不再突出“写什么”而在乎“怎么写”，不再突出文学的社会功用及价值，而强调小说自身的艺术探索问题，这一时成为文学的新风尚。

在这场勇敢而激烈的文学实验中，这种独立自主的“文学”观念被推向了极限。当然，当年这种看似纯粹的艺术实验与技术演练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体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先锋派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派别，只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年轻作家选取了一种隐晦的，或者安全的写作方式，从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藩篱中逃脱，转向语言和形式实验。这可谓“积极的逃逸”，这种逃逸既显示了他们在现实中的无奈，也显现出他们在艺术上的敏感与自觉，客观上也确实回归了文学艺术自身。格非曾谈到文学的叙事问题，他认为：“我发现叙事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是一个修辞的问题，它当中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变革。……为什么一个作家会采取这个叙事方式，这背后有很多的政治、社会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手段。”^①这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对先锋派作品仅仅是着眼于单向度的形式探索与实验，其实是一种狭隘的理解与认识。

归根结底，社会与时代的变化影响了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中，呈现出由内部生发出来的躁动不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并逐渐打破了昔日固步自封、老气横秋的沉闷状态。显然，这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关，是现实的一种自然反映。它的自我裂变和大胆革新给读者群体、文学研究群体、文学创作群体带来“震惊”的体验与复杂的情

① 张学昕、格非：《文学叙事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超越》，《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第58—73页。

绪反应。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在跌跌撞撞的摸索与实践逐步走向成熟。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后，这种文学状况发生了变化，而且每况愈下，令人担忧。由于图书的市场化趋向，文学也大规模地走向市场，文学不得不考虑市场与受众的问题。这对整体的文学艺术水平与艺术创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事实上，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缩减与降低，我们感叹的是文学地位的今非昔比，即主要指向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社会功用。但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社会功能并不由文学自身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历史决定的。因此，中国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另一种方式显现出来，它变得更为隐蔽，更为内在，也更触及人的灵魂。文学以其更加灵活、自由、柔软的方式存在于当代社会，文学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进当代生活。

其实，尽管文学的复兴时期已经逝去，文学褪去了意识形态的宏大外衣，但是，文学却以更本真的方式与社会、与人类发生勾连，文学写作也成为个人精神的延展。因此，我以为，对于中国文学而言，现今时代正是正常、恰当的时代，文字可以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可以与生命联系在一起，可以与个体的精神际遇联系在一起。文学始终有着一种内在的力量，可以坚韧地、沉静地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存在于文本中，存在于书写中，存在于真诚的阅读中。

从整体上看，走过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依然步履艰难，所幸文学之光一直在指引向前，文学始终在发声，始终在场。

二、先锋视野里的格非

时隔多年，我们现在回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八十年代

中后期的那场轰动一时的“先锋”小说潮流，可以更理性、清晰地把握它的价值与意义。其中，格非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无疑是最富有生机与活力、最富有反叛精神的一代。甚至，学术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先锋派文学是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接续与重演。尽管两代文学前后相差半个多世纪，然而，两者在面对西方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迎拒立场上却十分相似。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人历时性的旷日持久的文学实验与理论成果，中国人共时性地接受了，并在强烈的“追赶”“创新”“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这一连串强劲的欲望驱动下，用短促的时间、急切的心情、匮乏的经验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文学历史全部实验了一遍，但我们要明确一点，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理论与思潮，在进入中国本土之后，扎根于中国现实，结出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风情的果实。当然，我们不是否定他者的影响——中国文学受到外来文化的濡染从而发生了变化。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学转向从根本上说还是文学自身选择与发展的结果。因为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学自我的寻找与建构是一个迫切的天然使命，这一使命既不可能完全脱离外部影响，但也不可能始终笼罩在他者的阴影之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格非这一代作家，他们的价值与意义更为清晰明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凭借那充溢着“异质性”色彩与现代气息的作品，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风暴。他们在创造中既揭露了生存体验，又展开了先锋形式探索，努力践行文学的一种理想。虽然人们对于先锋小说的玄奥性、前卫性、内倾性有着各种的争议与质疑，但是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看，当时这些作品的出现符合文学内部发展规律，并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实际上，“先锋”虽然外表前卫叛逆，但其精神内核却是与文学主潮并行不悖的。

评论家洪治纲曾对先锋作家的文学实践表达了充分肯定：“我

们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出当今这样丰富复杂、多元共存的审美格局，并产生了一批又一批足以经受历史检阅的经典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离不开无数先锋作家在不断反叛传统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艰辛探索。”^①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格非及其同时代作家那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历史注定了他们是过渡的一代、转折的一代，他们的出现可谓承前启后，既接续了自“五四”时期开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并得以汇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文学之流，从此以后，中国当代作家的“西方情结”得以暂时缓解或者消除。先锋作家们对西方这一宏大“他者”尽情模仿甚至戏仿，最终有效地稀释了那曾经无所不在的“影响的焦虑”，而之后几代作家的写作便几乎全部站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肩膀上，不仅拥有了更高的起点与更宽视野，也不必再重蹈覆辙。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文学思潮，先锋文学早已于九十年代后随着众多先锋作家的转向而销声匿迹。当然，细究起来，先锋的转型还是有着不同的方向和性质的，有的选择了遁入市场的漩涡，有的选择了坚守写作的初心，有的皈依了宗教，有的回归了传统，都是试图在自己的文本中重建新的世界图景作为精神家园。凡此种种，无论是选择哪一条道路，先锋作家们已经不能重回往昔的辉煌。但那一段“先锋的岁月”却是意义非凡，并且影响深远的。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赋予了马原、格非、余华这一代人以历史的重担与荣耀，也宣告了他们“历史中间物”的命运。大多数作家似乎被动地接受了历史强加给他们的这一命运：他们中的某些人意气风发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便心安理得地载入史册了；他们中的另外一些人或者以徒劳无功的突围

^① 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1页。

方式，或者以拒不退场的顽固留恋方式，而使自己成了令人可悲可叹的不合时宜的存在。

应当说，还有一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作家，他们拒绝接受历史的角色安排，试图摆脱历史的局限，独辟蹊径、勇往直前地开辟自己的文学天地，在喧闹浮躁的市场化时代始终坚守文学的诗性与初心。这些异质者可谓时代的精神先锋，他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技术层面与文学层面。在这场文学革命中，格非和余华、苏童一道，被认为是中国先锋文学最为重要的三个代表作家。而格非的作品，凭着精神上的玄奥抽象、形式上的复杂难解，代表了那一时期小说写作所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和难度。

三、格非的写作小史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浪潮中，格非的位置有其特别之处，首先，他的名字是不容忽略的。1986年以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在文坛上初露头角。次年，以笔名格非在《收获》第六期上发表被《上海文学》退稿的《迷舟》而名声鹊起。格非以其叙事的技艺对传统小说的叙事造成致命冲击，从此少年成名，并随之成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创作伊始，格非便以其个人气质与独特的创作风格，为读者建构了一个迷幻、玄思、奇特的世界。与其他先锋作家相比，格非无疑是低调内敛的：在艺术形式上，他擅长迷宫似的叙事手段、梦幻般的叙事氛围；在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上，格非对人的欲望与精神困境的描写、对世界的病态与无序的揭示，更是显现出独特的孤寂品质、沉郁而古典的风格，以及敏锐的洞察力与准确的表达能力。从根本上看，格非小说的价值与意义在于“有意味的形式”与“有内涵的主题”的良好结合。